我的父亲母亲

○贺　阳

我 1950 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父亲曲方明在“文革”结束后，被刘达校长调到清华，担任过学校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母亲裴棣（原名贺文贞），1946 年受地下党组织派遣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他们两人的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和磨难，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命运的起伏中艰难跋涉的历程。

父亲曲方明是山东掖县（现莱州市）沙河镇人，1922 年 8 月出生。爷爷是一个乡村医生，奶奶在镇里办过小学校，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在黄县（今龙口市）上高中时，受到一位共产党员老师的影响，开始参加抗日活动。1939 年，高中尚未毕业，他和低一班的同学马石江放弃学业，奔赴胶东抗日根据地。父亲在那里的青救会工作了几年，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 年，奶奶命父亲把我大姑与其前夫的儿子送到四川去。母命难抗，父亲没有来得及向领导报告，就去了四川。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奶奶担心父亲的工作太危险，找了个借口让他离开。父亲那时年轻，“组织观念”也不那么强。到四川绵阳以后，父亲给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写信报告这一情况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领导指示他，既然已经到了四川，就不用急着回去，可在当地寻找党组织开展工作。

父亲进入绵阳六中，边上学边从事抗日活动。1944 年，父亲考入燕京大学（当时燕大在四川成都）新闻系后，成为燕大地下党的支部书记。

曲方明（左 3）、裴棣（左 1）夫妇与儿子贺阳（右 1）一家（1995 年 10 月）

日本投降以后，燕京大学从成都迁回北京，父亲担任中共燕大地下党南系支部书记。1946 年，党组织决定让父亲以燕大新闻系学生的身份采访司徒雷登，揭露美军的一些行为。当时司徒雷登已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但是还没有卸任燕京大学校长，他那次是从南京回燕大办事。去采访的路上，碰到一个同学，要求和父亲一起去，他们就一块儿去了。采访过程中父亲向司徒雷登提出

的中心问题是：美军为什么不撤出中国？采访完毕，随行的那位同学拿出一部相机，给父亲和司徒雷登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文革”前一直贴在我家的相册里，父母在新疆党校的同事到家里串门，可能有人看到过。“文革”中这可了不得，毛泽东说“别了，司徒雷登”，这里居然有一个跟司徒雷登一起照相的“孝子贤孙”！大字报上说我们家把司徒雷登的大照片挂在墙上，一时间，父亲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1948 年，国民党抓人的黑名单中有父亲，党组织决定让他撤回解放区。到解放区不久，父亲被送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期的学员。马列学院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的领导杨述很器重他，不久杨述调北京市委工作，想带他一起过去，可是父亲不去。可能是受燕京大学生活的影响，父亲很向往大学教授的职业，他主动要求到团中央所属的中央团校去教书并如愿以偿。

在中央团校担任党史教研室主任期间，碰上了反胡风运动。书生气十足的父亲有一次跟人开玩笑说：“你们抓胡风，我还和他吃过饭呢。”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却主动送上门。被狠狠地查批了一顿之后才搞清，和他一起吃饭的是胡绳而不是胡风，他自己记错了。但是整了不能白整，领导也要下台阶呀，正好中央机关要派一批干部到新疆去支边，领导就点名让父亲去新疆。1955 年 11 月，我们一家四口奔赴西域，那一年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一岁。到新疆后，先分到西部边陲伊犁，一年后在母亲的竭力争取下回到乌鲁木齐。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父亲听到毛泽东说“让人讲话”，“会上出气，会下看戏”，“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等等，高兴地跟母亲说：“我们党这回可真要有点民主了！”在自治区党委举办的三级（区、地、县）领导干部读书班的讲堂上，作为老师的父亲讲到：我们党要接受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晚办几年是不是更好等，当时台下一片喝彩声。

可是不久，在北戴河会议上领导人重提阶级斗争，父亲和另外两位教研室主任立刻成了活靶子。小会批、大会斗，陆陆续续搞了两年多。最后父亲被定性为“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撤职降级，下放农村搞社教。

临去南疆农村之前，父亲查出得了肺结核，正在活动期。他拿着医生开的诊断书去找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张凤岐，说能不能稍晚一点，等病情好转了再下去。张说：“你要知道，你是犯错误的人，不行！”父亲到了农村，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却吃着最差的食物，每天还要下地干活儿。后来父亲死于慢阻肺，与当年的带病苦劳不无关系。

粉碎“四人帮”之前，我和母亲、妹妹陆续离开新疆，只有父亲留在那里。1978 年，母亲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学甘英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达推荐了父亲，可是那时父亲的“反党错误”还没有平反，档案袋里装满了“反党证据”。好在刘达这位老同志历史上也“犯过右的错误”，他没有把父亲档案里的东西当回事。这样，父亲就被调到清华大学，担任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后来

又调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最后从那里离休。

我的母亲裴棣，1924 年 3 月出生于辽宁法库县。姥爷早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母亲很小的时候，姥爷已经是黑龙江省立医院院长兼陆军医院院长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齐齐哈尔，他们要姥爷继续担任院长，姥爷心想不能给日本人做事，他说自己脑袋有病，坚决辞了职。他失业后没有收入，一家人只好靠出租过去置办的房产维持生活。

1939 年，母亲 15 岁，她向姥爷提出要去北平念书，姥爷手头虽然非常拮据，但思量再三还是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后来母亲说过多次，她这辈子最感谢姥爷的就是，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还勉勉强强供她到北京上了几年学。

母亲考入位于北平灯市口的贝满女中，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教会学校。她在这所学校读了六年。在学校里，母亲是一个有名的穷学生。她买不起衣服，就买块布自己做；她还自己浆鞋底做布鞋；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她没有钱回不去，只能自己住在学校里；有时找到做家庭教师的工作，尽管薪资微薄，她也欢喜不已。好在母亲的学习成绩相当好，各门功课几乎都是全班第一；各种体育运动的成绩也不错，还是篮球和排球校队的队员；她像姥爷一样，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同学们不但没有人看不起她，还都愿意和她交朋友。

1945 年高中毕业前夕，母亲和一个要好的同学经西安去重庆，在重庆报考了上海医学院并被录取。几个月的“大后方”生活给她的感觉是，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实在是太腐败了，听人说共产党好，母亲就想去延安。到陕西后，赶上国民党封锁，她又不会说陕西话，过不去，只好又回到北平。

1946 年 5 月，经中共地下党员曾平介绍，母亲到了张家口解放区。她把曾平写的介绍信交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工部工作人员。第二天，一位老同志找她谈话，这位老同志就是当时的城工部部长刘仁。刘仁爱开玩笑，他上来就问母亲：你的介绍信呢？母亲说：交了。刘仁问：交给谁了？我怎么没看见呀？母亲着急了，说交给一个男同志了。这时刘仁从兜里掏出一张小纸条，说：在这儿呢！

谈话中，刘仁知道母亲的不少同学考上了燕京大学，刘仁当即决定，让母亲回北平打入燕京大学做学生工作。母亲原来是想留在解放区的，既然组织上做了决定，也只好服从。回到北平，母亲同时报考了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燕京先发榜，她就上了燕京。可是燕京是教会学校，学费不低，母亲哪有这么多钱？好在一个月后国立清华大学也发榜了，母亲就转到清华大学社会系就读。这时，她已经加入了中共党组织。

在清华，母亲是一个活跃分子。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她竞选学生会常务理事并成功当选，做进步学生的工作为党扩大影响，她积极发展党员，她是“大家唱合唱团”的成员，还是校排球队的队员。1948 年，国民党出黑名单抓人，母亲也在里面。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她撤回了解放区。

在解放区，直到 1949 年上半年解放军和中共党政机关进北平时，母亲一直在张秀岩的领导下工作。张秀岩是一位老同志，参加革命很早，是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姑姑，张洁清和妹妹都是在她的引领下走上革命

道路的。刚到北平不久，主持妇女工作的张秀岩让母亲去香山慈幼院做一个调查，母亲回去后写了一个报告交给她。有一天，母亲正在张秀岩那里（当时在海淀青龙桥，还没有进城）汇报工作，正巧彭真去了。在母亲退出来之前，张秀岩对彭真说："你说不错的那篇香山慈幼院的调查报告，就是她写的。"

进城后，张秀岩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她很器重母亲这个年轻人，觉得母亲有能力，工作泼辣、不惜力。她提出让母亲担任新成立的北平市妇女联合会的组织部长。当了一段组织部负责人之后，母亲觉得妇联机关有一些资格相当老的老同志，把自己摆在她们上边很不合适，就坚决不当这个组织部长。后来有人跟母亲说：你傻不傻啊，别人争还争不来呢！母亲跟我说，当时就是想干点事儿，没有那个当官的概念。1952 年，母亲被调到北京女十中担任校长和党支部书记，还兼任附近一所新建中学的党支部书记。

肃反后，父亲被调去新疆支边，母亲的上级领导、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国梁不让母亲走，他说母亲的孩子太小，要走也过几年再走，到时他派人送母亲去。就在前不久召开的市人代会上，彭真刚刚点名表扬了母亲所在的北京女十中，说这所中学高考升学率上得很快，工作做得好，做得细。既然局长说了话，母亲又去咨询她的同事、女八中校长王季青，那时王季青刚随丈夫王震从新疆回到北京不久，对新疆的情况比较了解。王季青说，你孩子那么小，还是全家一起去吧。母亲最后决定还是带我们和父亲一起走。

坐了 20 多天火车、汽车，我们总算到了乌鲁木齐，父母又被自治区党委分配到靠近中苏边界的最西部自治州——伊犁。在正式报到之前，有一次母亲出去办事，手包在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偷走，手包里有钱不说，还有母亲调动工作的介绍信和行政关系、组织关系等全部文件。无奈之下，母亲只好给北京市教育局打电话并写信说明情况，请求补寄有关文件。文件寄来后，母亲发现她的工资关系被提升了一级。开始以为是搞错了，母亲特意打电话问北京市教育局，教育局的同志说，正赶上调整

2017 年 4 月 12 日，裴棣学长参加解放战争时期校友聚会。前排左起：吴宏宛、裴棣、彭珮云、汪家镠、傅瑊；后排左起：钮友杰、黄庆华、张其锟、王浒

工资，局里领导研究后决定给母亲调升一级。这真是“因祸得福”！

到伊犁后，父亲母亲都被分配到州委党校工作。在一次全州党代表大会上，母亲被要求作大会发言。她上台后，就州委机关特别是州委组织部的官僚主义提出批评意见，当时台下的几百人热烈鼓掌，母亲讲出了大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多少年后母亲跟我说，当时刚从北京过去，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北京，那时党内还比较民主，给领导提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新疆可就不一样了，当时新疆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来自部队，他们习惯于服从、听话，不大习惯听不同意见。好在母亲 1956 年底就离开了伊犁，否则 1957 年“反右”就麻烦了。

到了乌鲁木齐，母亲被安排到一所大学新疆语文学院工作。本来区党委准备让她担任院党委副书记，但是党委书记高某提出母亲档案里关于我父亲托派问题的材料（1952 年母亲秉公办事得罪领导，肃反时档案里被塞进的黑材料），区党委也没有复查，就让母亲改任院长办公室主任。

高某进疆时是六军的一个组织科长，资格较老，文化不高，心胸不宽。母亲在语文学院期间，他把自己的妻子提拔为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看不上一位副院长，组织人员给这个副院长贴大字报，想以男女关系不正为名将其搞下去。而母亲经过了解，认为高某的说法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这样对待一位老同志是不正常的。除直接给高提出意见外，母亲还就这些问题向自治区党委有关领导作了反映。后来，自治区党委支持了母亲的意见，高某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件事情之后，母亲要求调到父亲所在的自治区党校，在党校的哲学教研室当了一名教员。

1961 年，自治区党校派母亲去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四年。学习期间，父亲“犯了反党错误”，接受多次批判之后，1963 年被派到南疆农村去“搞社教”。那年我 13 岁，妹妹 9 岁，我们在新疆一个亲戚都没有。一个周末下班以后，母亲带着中央党校开的介绍信，找到管中央党校户籍的海淀公安分局，和值班民警讲到我们家的困难，问能否把我和妹妹的户口转到北京，让我们到北京来上学。没想到民警同志很干脆，说没有问题，你去接孩子吧，手续我们给办。那时的社会风气真是太好了，母亲没有找任何熟人帮忙，更没有送一分钱的礼。

母亲是一个“大气”的人，这一点可能“遗传”于我的姥爷。她后来有了一点钱以后，也像当年的姥爷一样，时常接济那些有困难的亲戚和同学、朋友。1964 年暑假，中央党校要求在校的学员一律停止放假，集中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我和妹妹就住在党校的招待所里，和我们同住同玩的，还有母亲党校同学陈迹阿姨的三个儿子——姜阳、姜甡和姜山。母亲跟陈迹阿姨本来不算熟，看到孩子们一起玩得那么好，也就走得近了。母亲了解到，陈迹阿姨的丈夫曾留学日本，参加革命后从事情报工作，刚解放就积劳成疾去世了。小三儿姜山好像是个遗腹子，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陈迹阿姨行政 16 级，每月工资不到 120 块钱，抚养三个儿子不算富裕，特别是姜阳上大学之后。母亲决定，从那时起每个季度给陈迹阿姨 100 元，资助姜阳上大学。1965 年母亲毕业回到新疆，继

续按照约定每季度往北京汇款。记得“文革”开始后，我在陈迹阿姨家住了两个月，母亲一次就寄去 500 元。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 1968 年父亲被扣发工资时为止。姜阳当年考上北京石油学院，后来他多次说到母亲对他们家的帮助。

1974 年，母亲在北京陈迹阿姨家正好碰上姜阳回去，他主动问母亲想不想从新疆调回来。母亲那时正想着如何离开新疆，她不想把我和妹妹留在那里。姜阳说可以先调到北京附近的河北廊坊，那里有一个石油部新成立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姜阳和石油部的领导很熟，母亲的调动很快就完成了。母亲后来老说：“多亏了姜阳，我那时都 50 岁了，没人说话谁要啊！”我心想，善有善报，好心得好报，真是一点不假。母亲一生与人为善，热情助人，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1978 年父亲从新疆调回北京，母亲也是功不可没。

1965 年，母亲在中央党校理论班的学业结束，结束之前，有同学帮她联系留在北京工作。母亲找甘英（刘仁夫人，也在理论班学习，住在母亲隔壁）商量，甘英说：“老曲（我父亲）犯了错误，你自己离开新疆不好吧。”于是母亲又回到新疆。

2010 年校庆，裴棣学长返校参加毕业 60 周年活动，做大会发言

甘英离开中央党校以后，到北京同仁医院担任党委书记，“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母亲调到廊坊管道局工作之后，经常到北京去看她。那时刘仁已被迫害致死，甘英住在一间小黑屋里。甘英告诉母亲，刘仁在监狱里戴着手铐住了六年，临终时他跟甘英说：“千万不要告诉孩子们我在监狱里的事，他们知道了会恨我们党的。”甘英还告诉母亲，过去刘仁在华北局城工部和北京市委工作时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个老部下，曾在大街上迎面碰到她，就像不认识一样。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次甘英主动跟母亲说，刘达调到清华大学当党委书记，想调一些老同志去，改变一下清华的干部结构，不知老曲愿不愿意去？刘达曾是刘仁在莫斯科大学时的老同学，甘英推荐我父亲，自然没的说。

1978 年，母亲从管道局调到中央党校，算是回到了北京；后来又去了中央党史研究室，最后从那里离休。

由于早年肺部受到的损害，我父亲于 2004 年去世。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和我住在一起。她乐观开朗，思维敏捷，耳聪目明，每天和我一起去游泳，一次能游 500 米；老太太还经常约她贝满女中、燕京大学以及清华社会系、清华地下党的同学老友们来家里聚会，一拨拨老人凑在一起，其乐融融。

我的父亲母亲给了我很多东西，我感觉最重要的，是让我随时牢记：不管处于何种环境，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面对什么人物，都要坚守自己的底线，做一个正直正派的人。